

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 Fashion, History, Nation

By Antonia Finnane

Sydney: UNSW Press, 2008

360 pp. ISBN 978-0-2311-4350-9



Antonia Finnane (安東籬)，現為澳洲墨爾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專業領域為 16-20 世紀中國社會史與物質文化史，代表作為 *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 (中譯本：《說揚州：1550-1850 年的一座中國城市》，北京中華書局出版)。目前其研究重心是晚清的消費，尤著重於商店與消費行為關聯性之研究。本書 *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 Fashion, History, Nation* (《中國的服飾變遷：時尚、歷史、國家》) 的研究計畫曾獲 2001 年漢學研究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

安東籬認為因為深受一個既定觀念的影響：「19 至 20 世紀中國服飾是傳統與一成不變的！」所以歷史學家們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認為時尚是某種西方特有的產物。事實真是如此嗎？她藉由爬梳檔案照片與報章雜誌圖像，呈現出帝國晚期最新款式時裝，以此證實充滿活力的流行時尚此時早已是中國人生活的一部分。儘管 20 世紀早期來華的外國旅人仍有中國服飾簡單且單調的印象，然而不容否認的是現代時尚的主要特徵確實已在中國開始顯現，特別是在上海。著長袍的男士穿戴起毛帽與皮鞋，女士開始穿著合身的短上衣與窄長褲，舶來機織布取代了手織布。這些革新標示著服裝革命的開始，改變了接下來半個多世紀中國的服裝文化。透過安東籬嚴謹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在世界貿易體系、城市發展與革命運動的背景下，中國流行服飾變遷與歷史、國家認同的關係。

本書第一章為中國服飾史的研究概況回顧與導論。第二章敘述 16 世紀到 20 世紀初西方視野中的中國服飾文化。第三章則是以中國人的角度為著眼點，介紹明至

清末的服飾文化，揚州與蘇州是當時引領時尚的城市，有蘇式與揚式之稱，本章以揚州做為論述重點。第四章由清朝的結束談起，正是歷千古未有之變局的同時，中國的服飾進行了一連串的改革。1911 年的革命正好發生在中國經濟變革的時期，此變革促進現代時尚工業的出現。到了 1920 年代，主要的城市中心皆已出現資本主義、工業產品、廣告、時尚雜誌與百貨公司。第五章描繪 20 世紀初期中國時尚首都上海的工業發展，包含：紡織業、裁縫與時尚畫報等。城市服飾的變遷步調快速，此時期上海維持著新潮引領者的地位，甚至在文化大革命服裝保守的年代仍是如此。

20 世紀中國的服裝時尚變化與政權的更替有很大的關連，以女裝為例，1911 年辛亥革命時期的特徵是高領合身上衣，五四運動時期是短上衣搭配裙子。1926 至 1928 年國民革命北伐與之後對日抗戰時期，服裝更加被賦予國家意涵，此時期女裝代表為旗袍，男裝為長袍，分別在本書第六章與第七章討論。除了長袍，軍裝的流行與性別認同亦是第七章討論的重點。第八章的主題為共產主義革命時期的代表服飾幹部制服，這是一種蘇聯式、無階級、無性別的服裝款式，此時期的服裝時尚受社會主義與國家認同影響，但國家並無法全面束縛或規範人民對時尚的追求，作者舉郁風（1916-2007，著名中國文人郁達夫的姪女）的服裝理論為例說明。第九章為文化大革命時期，代表服飾為軍隊制服，作者以毛澤東（1893-1976）與江青（1914-1991）的服裝款式為例。第十章討論改革時代的服飾，1970 年代晚期中

國服裝時尚終於恢復與外界的交流，此時期的服飾追求多樣化、全球化與文化歸屬感。

透過此書我們可以明瞭政治與服飾時尚之間複雜多變的關係。清朝政府強制規定人民該如何穿著，王朝滅亡後，接續的中央與地方政府仍持續對服裝進行控制。概括而言，過去超過一個世紀以來，政治不僅影響中國

與世界時尚潮流的互動進程，也影響生產與消費自由（時尚的必要條件）。然而，安東籬嘗試告訴我們政治並非服裝變遷的唯一因素，新的科技、工業、商貿和文化交流等因素亦值得關注，「時尚」的創造與流行正是此多元因素相互激盪下的結果。（詹怡娜，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生）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By James A. Millwar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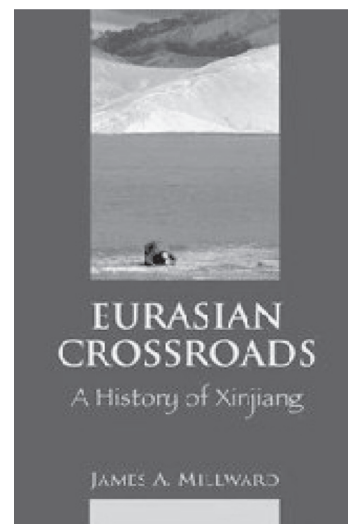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7

352 pp. ISBN 978-0-2311-3924-3

新疆作為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其歷史亦甚為久遠。中國傳統史書歷來將新疆地區稱為西域。早在漢代之前，西域就與中原地區有所交往。漢武帝於建元三年（西元前 138 年）派遣張騫出使西域，開始與西域地區建立起政治聯繫。太初四年，漢朝在西域設立使者校尉，進行屯田。神爵三年（西元前 60 年），漢朝在此地設西域都護府，管理大致今日之新疆地區。從此，西域正式納入漢朝版圖。到東漢時期，西域都護府得以繼續發揮重要作用。魏晉至隋時期，歷代都在西域行使管轄權。十六國時，前梁在此地設立高昌郡、鄯善郡、且末郡以及伊吾郡。唐代在西域的管轄範圍超過了漢代，並對當地實行不同的管理制度。唐朝之後，西域地區曾經出現過三個較為強大的地方政權，先後服屬於中原政權。元朝在西域實行行省制，曾先後在撒馬爾罕設阿姆河中書省，管轄河中地區；在今霍城一帶設阿力麻裏行中書省，管理伊犁至巴爾喀什湖以東以南地區；在今吉木薩爾設別失八裏行中書省，管轄天山南北

地區，後又在別失八裏行省之下設別失八裏、和州以及幹端三

個宣慰司，分管北疆、南疆以及和闐地區事務。明代稱新疆地區為別失八裏，後改稱為亦力巴里。明朝雖然未能直接管制西域西部地區，但是統治當地的察合台家族依舊臣服於明朝，而西域東部則受明朝直接管理，永樂四年建成哈密衛。清朝在統一新疆地區後，將額爾齊斯河以東以北歸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額爾齊斯河以南以西及天山南北地區則歸伊犁將軍統轄，哈密至烏魯木齊一帶則由甘肅布政使管理。光緒十年（1884）新疆正式建省，省會迪化（今烏魯木齊）。光緒三十二年（1906）將阿勒泰地區從科布多參贊大臣管轄改為直隸於中央，並於 1919 年劃歸新疆。中共建政之後，按照民族區域自治的原則建立起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但是近年來新疆問題亦時有起伏。由於地處歐亞大陸的中央地帶，中國新疆往往成為歷史上大國競爭的中心舞臺。進入近代



以來，隨著中國國力的衰落，新疆地區日益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預。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新疆地區的穩定和健康發展是中國穩定和健康發展的一個顯著標竿。在研究新疆歷史的過程中，除了關注國內的相關著作之外，也不應忽視國外學者的相關科學著作，撇開形形色色受到政治偏見籠罩的西方著作，*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歐亞十字路口：新疆歷史》）一書是近年來出現的幾部較為系統客觀地研究新疆地區歷史的專門性著作之一。

本書內容包括三大部分：前言、主要內容以及附屬部分。主要內容中又細分為八部分，分別為：1. 古代的碰撞（原初時代至 8 世紀）；2. 中亞勢力（6 至 16 世紀）；3. 在伊斯蘭與中國之間（16 至 19 世紀）；4. 在帝國與國家之間（19 世紀晚期至 20 世紀初期）；5. 在中國與蘇聯之間（20 世紀 10 年代至 20 世紀 40 年代）；6.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中（20 世紀 50 年代至 20 世紀 80 年代）；7. 在中國與世界之間（20 世紀 90 年代至 21 世紀）；以及 8. 「最後的總結：平衡行動」等。（這種時段劃分與大陸新近的《新疆通史》相類似，大陸編纂中的《新疆通史》全書為分 13 卷 15 冊，共約 400 萬字左右。採取通史加專史的編寫體例）附屬部分包括「附錄：新疆歷史年表」、「總書目」以及「索引」。在前言中，作者認為，「新疆」這一地區在歷史上有過很多的稱謂，諸如「中國的土耳其斯坦（Chinese Turkestan）」（此稱呼是與「俄屬土耳其斯坦（Russian Turkestan）」相對應而言的，這種稱謂存在爭議性，因為這經常會聯繫到「東突厥斯坦」分裂主義問題。參見本書頁 1 等等），這一稱謂反映了這一地區歷史上的多族群、多文化特徵。作者在書中稱自己既非是一個漢民族主義者，也不是泛突厥民族主義者，而相反，他更願意將自己視為漢人和維吾爾人（以及在更一般意義上的中國人）的共同朋友。他試圖以這樣的姿態研究新疆史。本書的目的並非側重於

政治事件對當代新疆的影響，而是對在世界歷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這一地區的歷史加以概述，而關於這方面，之前尚無系統的英文著述。儘管對於新疆歷史有一些重要的英文專著，但是那些非專業的讀者們除了一般的背景知識之外難以獲得更多的資訊，本書則力圖對新疆各時段的歷史狀況加以系統性的論述，以彌補這一空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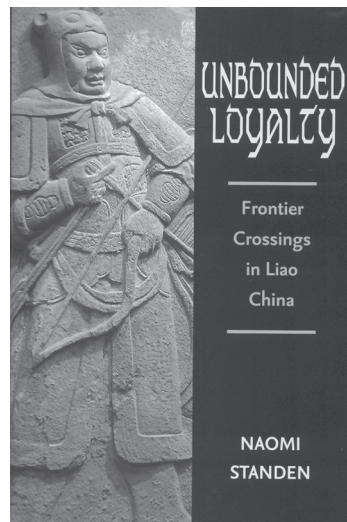
雖然本書主要內容分為八部分，但是主要還是側重於清代之後的新疆歷史。這有其歷史的原因。新疆問題之成為一個困擾中央政府的真正關鍵性問題始於清朝。在康熙、雍正、乾隆朝，清廷對新疆地區（當時的準噶爾帝國區域）的軍事政治行動成為當時清朝政治機構（如「軍需房」、「軍機處」的設立等等）和社會改革的一個重要推動因素，而這些政治機構和社會改革又連帶地對未來的清代政治軍事形勢產生了深遠影響。清朝對「最後的草原帝國」——準噶爾的軍事行動成為清朝一舉解決西北邊疆問題的關鍵之一。（這裏採納湯瑪斯·巴菲爾德《危險的邊疆：游牧帝國和中國》（Thomas J. Barfield, *The Perilous Frontier: 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 Cambridge, Mass.: B. Blackwell, 1989）一書的觀點，見本書第 8 章，尤其是頁 276-277。本書通過對 2000 多年歷史時段內游牧帝國和中國的歷史關係的考察，提出了一個解釋包括蒙古帝國在內的游牧大帝國興盛和衰亡的政治和經濟組織分析模式，並對中國與這些帝國的關係作了貫通性的研究。在本書中，作者還指出，外族王朝對中國北方地區統治的週期律在某種程度上表現為一種基於集權化（centralization）與分權化（decentralization）之上的機制的更替過程。對於更為廣義上的中國北部邊疆變遷感興趣的讀者，可以參閱本書。除了具體論述，本書亦包含較多的圖片資料，從中可以給讀者以更為直觀的印象。（袁劍，德國弗萊堡大學哲學學院歷史系博士生）

Unbounded Loyalty: Frontier Crossings in Liao China

By Naomi Stande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296 pp. ISBN 978-0-8248-2983-4



自從上世紀 40 年代 Karl Wittfogel 和馮家昇先生合著的 *History of Chinese Society: Liao (907-1125)* 奠定了西方遼史研究的基石以來，很長時間西方學者對遼代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研究仍然拘泥於傳統中國史學的影響。但在過去二、三十年中，很多學者已經開始反思傳統史學中漢化模式（sinisization）和漢族中心觀（sino-centric view）的侷限性，逐步糾正對「征服王朝」（conquest dynasties）和異族文化的偏見，並嘗試從新的視角來客觀討論契丹的歷史和文化地位。其中較有影響的有關遼代的論述可見於 Herbert Franke 和 Denis Twitchett 編撰的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1994），以及 Frederick Mote 的 *Imperial China: 900-1800*（1999）等書中。

作為一名一直關注北方草原民族和族群文化研究的專家，Naomi Standen 教授在這本新書中以其獨特的視角和精闢的見解邁出了近來遼史研究中極有意義的一步。她以十世紀燕雲地區部分漢人官員和將領依附契丹政權的史實作為切入點，探討了從唐滅亡（907）至宋遼澶淵之盟（1005）間這一複雜時期內人們忠君觀念和邊界意識的變化，以及族群間文化衝突與認同等一系列重要問題。其詳實的史料和充分的論證，不僅豐富了我們對五代遼宋時期北方地區政治、文化、社會發展的了解，也表明了根據當時人們對異族政權和文化認同的實際情況來重新思考契丹等游牧民族政權歷史地位的必要性。

該書主要包括兩大部分（六個章節）。第一部分（前三章）專注於界定一系列概念並探討相關觀念的變化，包括邊界（border）、族（ethnicity）、忠（loyalty）的意識及它們之間的關係。作者第一章一開始就提出了一系列

引人深思的問題：五代時期北方的邊界是如何劃定的？當地的族群意識又是如何發展的？北方官員為甚麼頻繁換主？五代人和宋人對忠的理解有區別嗎？第二章中作者對戰國以來中國歷史中忠的觀念的變遷做了精煉描述並極有見地的提出：如果 10 世紀時的忠是建立在一種君主互惠關係上的意識（relational loyalty），那麼 11 世紀時的忠則又回歸為一種道義上的，強調附從於唯一君主的意識（idealistic loyalty）。這點也可以從五代到宋元間史學家評論歸遼官員立場和態度的相應轉變中看出。第三章簡略討論了早期歸遼官員和他們附遼舉動對邊界形成所產生的影響。如果說五代時期國與國之間的邊界線只是觀念上的，實際邊界由邊境地區割據勢力不斷更替的臣服關係來最終決定，那麼宋遼對峙形成以後，這種邊界則變成地理上更具體、更穩定的界線。

第二部分（後三章）則以具體個案來討論漢人官員為何選擇效忠契丹政權以及他們在遼廷的活動。作者研究比較了不同時期的五個代表人物：李澣（d. 962）、韓延徽（882-959）、張砺（d. 947）、趙延壽（d. 949）、王繼忠（d. 1022）；並在書後附錄了從相關史書中輯出的 225 例 10 世紀北方的「跨界者」（border crossers），主要包括投奔契丹的漢人官員將領和其他逃亡、被俘人員。這三個章節所討論的漢人歸遼經歷反映了這樣一個變化：10 世紀前半期由於中原政權的頻繁更替和多個地區割據勢力的同時存在，五代的官員和將領常常以比較實用的態度來選擇效忠對象。因此政權間政治軍事實力對比和某些個人因素的變化往往導致地方勢力改旗易幟

、歸附他國。尤其是在北方邊疆地區，漢人並未因民族意識而對異族政權充滿敵意。投靠異族建立的政權並沒有被他們認為是一種道德淪喪之舉，也不會使他們產生文化認同的危機。契丹政權也需要漢人或其他族屬的官吏來治理其新佔據的領土，因此不少漢人官員和將領得以通過歸附契丹來獲取更大的經濟、政治利益。但在 10 世紀後半期隨著宋遼對峙局面的形成和它們各自控制疆域的逐漸穩定，邊境地區的官員改變歸屬不再像以前那樣容易；特別是在 1005 年宋遼簽定澶淵之盟停止相互征戰後，邊界成為決定兩邊官員臣服於不同政權的最重要因素。投靠異邦的漢人不僅在政治上有極大風險，而且在道德上也備受譴責。當時的史學家歐陽修、司馬光對過去投奔契丹的漢人的記載和評論也顯示出宋廷不再對這些漢人持寬鬆的態度。

值得指出的是，該書對遼史研究中的一些重要概念所作的富有創見性的探討將會推動很多相關歷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化。首先，選取以漢人為主的「遼南人」（Liao southerners）和「跨界者」作為研究對象極具慧眼。作者發掘了當時漢人選擇向異族政權效忠這一歷史現象的重要意義，重思了異族統治下漢族自我文化意識的有

關認識。她的開創性研究是對傳統的漢族中心觀和正統王朝論的有力挑戰。其次，作者敏銳的觀察到 10 世紀的政治分裂（fragmentation）這一複雜歷史背景的特殊意義。雖然過去很多學者已經意識到使用多政權系統觀（multi-state system）來理解五代遼宋時期這段歷史的重要，但很少有人深入探討該系統在 10 世紀中的變化及其影響。而作者則抓住從五代多政權並立到宋遼兩大政權對峙這一時代背景的轉變，有力論證了它對官員的政治選擇及個人忠和族的觀念所產生的影響。另外，作者也強調了處於這一系統中的遼政權與其他「征服王朝」的不同。至少契丹人不同於元代蒙古人，他們很快放棄了入主中原的努力而與北宋相安共處近百年。不過該書也有一點遺憾，如未能充分利用近年來發現的燕雲地區中小官吏的墓誌銘等考古資料，也沒有足夠強調除契丹外，五代十國中還有多個非漢人政權存在的史實。但綜而言之，該書不僅對五代遼宋金元史的專家學者深有啟發，而且也在族群文化認同與交流的研究領域開闢了一個新的天地，值得一讀。（張帆，美國布朗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By Timothy Brook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08

273 pp. ISBN 978-1-5969-1444-5

本書作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現為牛津大學邵逸夫漢學講座教授，甫於今年（2008）5 月訪臺，擔綱為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主辦之「清華人文社會講座」發表兩場演說，並同時獲

邀於國內其他各大專院校與中研院進行演講。在此之前，以清大、中央等校之中文



所研究生為主所組成的「卜正民與明清文化史研讀會」，也在清大中文系、歷史所合聘教授陳珪的主持下持續了半年之久，為其來訪作先期準備。本書為其最新力作，以集中解讀荷蘭黃金時期的風俗畫家 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 的五幅油畫，以及另外兩個同樣來自荷蘭小城台夫特 (Delft) 的圖像為基礎，一方面描繪台夫特中產階級居民的日常生活，另一方面則藉此說明 17 世紀此一「人們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來編織聯繫與貿易往來網絡的世界」。有別於一般藝術史家尋繹的是 Vermeer 畫中的意涵，卜正民則是仔細檢視畫中所呈現的各種細微之物。因為畫中的物品可說是畫作產地與時代的標誌，畫家通常在不自覺的情況下將它們繪入畫中。卜正民因而主張將這些畫中的物品當作可以被打開的大門，而非單純通往另一世界的窗口，引導我們去發現 17 世紀連畫家本人都未察覺到的世界。

本書共分為八章，第一章從 Vermeer 僅存的兩幅室外風景畫之一「台夫特一景」出發，由畫中之港口、漁船，乃至於荷蘭東印度公司 (VOC) 的建築，談到全球性的氣候變遷與歐亞貿易。甚至 Vermeer 家族中人不乏捲入參與 VOC 的事業者。第二章討論的是作為本書封面之「軍官與微笑的少女」，畫中軍官所戴的大氈帽則為全書焦點，其材質來自歐洲探險家以火槍與北美洲土著換取的毛皮，同時造成歐洲社會的時尚潮流和地位競爭。第三章以「在窗前讀信的少女」開篇，說明其中盛放水果的中國瓷盤在畫中出現，如何體現了 VOC 遠達中國的貿易路線，以及台夫特商人流行的室內裝潢風格。第四章將「地理學家」之畫中人推測為微生物學之父 Antonie van Leeuwenhoek (1632-1723)，畫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清楚展示出印度洋那一面的地球儀，這是荷蘭航海家在 17 世紀初為了開拓航線必須面對的艱鉅任務。第五章轉而討論一件台夫特瓷器上的仿中國式彩釉，其上出現了一位抽著煙管的神仙，而中國的陶瓷畫家在 20 世紀之前是絕不會這麼畫的，由此帶出煙

草（其後包括鴉片）隨著貿易擴散全球的議題。第六章回到 Vermeer 的「秤天平的女人」，她正在秤的並非珍珠串而是金、銀幣，那是 17 世紀荷蘭家庭經濟裡的常見舉動，也代表形成中的資本主義所崇尚的新倫理。第七章主要討論另一位荷蘭畫家 Hendrik van der Burch (ca. 1627-1699) 的「玩牌者」，儘管此幅畫的表面構圖與「軍官與微笑的少女」極為相似，但卻缺乏 Vermeer 作品栩栩如生的特質。不過，重點在於它提供了後者未曾畫出的物品——一位倒酒的黑人童僕，從而透露非洲奴隸在 17 世紀的低地國（指今日的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數量大增的事實。最後一章以詮解英國詩人 John Donne 的詩句：「沒有人是一座孤島，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片」作結，其時歐洲地理知識的增長，道破此一隱喻背後的關鍵。

整體而言，本書是卜正民繼其前作《縱樂的困惑》(1998) 之後，將近代早期 (early modern) 的視野從中國內部擴展到全球總體之作。先前成為我們歷史嚮導的明人張濤，在本書裡也再次出現，連同徐光啓、文震亨、李日華等人，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歐洲人士，以接近民族誌的讀法帶領我們進入這段歷史。其中最重要的當然仍是 Vermeer，透過他的畫作、他的財產清單所記載的物品，重建當時由「貿易打造的世界」（借用彭慕蘭 (Kenneth Pomeroy) 舊作的書名）。卜正民筆下的 17 世紀，延續 16 世紀歐洲人對中國之嚮往，展開人員和物資方面龐大無比的流動性 (mobility)，以致全然改變了人們的日常生活。這種影響是雙向的，不僅 Vermeer 的畫中可見中國式的青白瓷器，即使董其昌的畫作也含有西洋技法。作為一本不以中國為中心的文化交流史，作者力圖以淺白的敘事，提醒讀者反省過去與現在的全球化世界。如果歷史還有什麼功用的話，或許正在於此。書後附有詳實的推薦閱讀書目與史料解題，值得參考。（葉毅均，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生）